

山西大同市政协委员呼吁：

共同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本报记者 王泳

“孩子自闭逃学、酗酒、打架、甚至跳楼身亡让人很痛心，这也折射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位。”山西大同市政协委员张岗日前在市政协全会期间表示，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扰或问题。

在与孩子交流期间，细心的张岗偶尔会听到身边的青少年因为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的处理，最终出现了非常严重后果。

“这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家庭都是非常大的打击，非常痛心。”为了让青少年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疏导，张岗在关心自己孩子身心健康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履职工作重心从民生问题转向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张岗说，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应只有身体的成长和学业的进步，更应该有健康的心理。“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根本环境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是健康的，社会也就是健康的。”

张岗与学生多次交流后体会到，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既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教育环境变化、学业压力增大，俗称“内卷”严重有关，也与父母期望值升高，亲子关系冲突增多、同伴关系处理不善有关，甚至与应试教育下学生普遍睡眠不足、缺乏运动也有直接关系。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遇到

一位遭遇‘校园霸凌’的小男孩，从品学兼优到抑郁差点自杀，校园霸凌的危害不仅仅表现在受害者的身体上有损害，更有心灵上的损害。”导致这样的后果，不仅是因为校园霸凌的存在，还有学校教育的缺失以及父母的不重视。

作为母亲，张岗认为，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多维度共筑防线，帮助青少年度过人生中最敏感脆弱、最重要关键的阶段。要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各负其责、相互监督、齐抓共管、整体联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格局，进一步营造出党政关怀、学校关心、家庭关注、社会关爱的良好氛围。

“尤其是学校，应严格落实减负政策，将学生的课业负担切实降下来，把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有精力徜徉在图书馆、美术馆、运动场上，能尽情汲取养分、挥洒汗水，对抗压力带来的焦虑情绪。”张岗呼吁，学校要真正落实每天一小时运动时间，把学校托管时间变成运动时间，而不是自习时间、补课时间。

张岗在调研时还发现，教学成绩与教师的个人利益挂钩会让学生成为压力传导的承受者，甚至有老师对后进生进行语言软暴力，给后进生带来极大的挫败感，从而丧失学习动力，直至焦虑抑郁。为此，她建议修改教师职称评定和评先评优制度，取消教学成绩与教师的职称评定和评先评优挂钩。这样，“可以让老师把更多精力和耐心给予后进生，更多地关注个体差异，更好地教书育人。”

民进厦门市委建议：

全面摸清厦门生物多样性“家底”

本报记者 照宁

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状况，是开展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今年厦门市两会期间，民进界别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展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本底调查的建议》的提案。

生物多样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标志内涵，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去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正式发布，2021年12月19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厦门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民进厦门市委在调研中发现，厦门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存在着本底不清、缺少生物多样性系统数据库、相关部门对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知之甚少等问题。例如，陆生生物中仅有鸟类数据较为完整，但尚不系统；蝴蝶种类最近的一次学术调查记录是1996年，数据陈旧；水生生物中海洋生物多样性数据分散在高校或研究机构，淡水生物基本无相关数据；两栖类和

爬行类动物数据主要由志愿者自发调查获得，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对此，民进厦门市委建议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监测预警和监管机制。针对绿地、湿地、海洋、河流等不同生态系统，开展系统性的基础调查，建立定期调查制度。鼓励绿地公园、森林公园、林场等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场所率先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和自然教育活动。

对于外来物种，需要建立预防预警体系，如褐云玛瑙螺、红火蚁等，应该综合气候变化因素预警并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借助生态云平台植入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模块，从国家级、市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红线范围等重点区域试点推进基于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技术示范研究工作，打造城市生物多样性智慧管理样板平台。

此外，民进厦门市委认为，针对海洋生态环境、陆域生态环境的物种保护、外来入侵物种控制等应该细化考核指标，如将生物防治开展面积、鸟类多样性指数、乡土物种比例、湿地面积等纳入考量，建议借鉴新加坡、温哥华等城市经验逐步建立基于生物多样性的更全面的考核体系。

民生微实事

MINSHENGWEISHI



安全知识送“上门”

贵州省遵义市近日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高群众防诈骗及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图为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党员干部向居民宣传相关知识。

罗永红 摄

江苏省宿迁市政协常委、民进宿迁市委副主委董振班建议：

建立弹性退休制度 支持隔代照护

本报记者 徐艳红

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着眼于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对相关生育政策进行了优化。该《决定》的出台，势必对近年大幅回落的生育率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就托育服务问题，该《决定》的第十六条：“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服务”中提出了“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护模式”。近年来，育儿教育专家对隔代照料一直持批评态度，但《决定》明确支持隔代照料，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江苏省宿迁市政协常委、民进宿迁市委副主委董振班谈了自己的看法。

社会化进程始于家庭，婴幼儿的监护抚养是父母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家庭对婴幼儿照护负有主体责任。董振班表示，据他调查了解，目前婴幼儿照护大致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完全由父母照护；第二种是父母、保姆共同照护；第三种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照护。在中小城市，主要以第三种方式为主，占比超过70%。即便是在京沪这

样的特大、超大城市，诸多熟悉的朋友也都处于“背井离乡”为娃带娃的状态。

虽然从现代育儿理念来说，隔代照护存在不少弊端，如不利于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隔代照护容易溺爱孩子、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差等，国外更是不提倡这么做，但是，现实是，隔代照护实为当下大部分国人不得不选择的婴幼儿照护的方式。

现实生活中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的照护模式广泛存在，但也存在一些切实的困难和问题。一是时间上存在困难。按照专家建议的23—28岁为黄金生育时段推算，育龄夫妇的父母一般在46—56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的父母一般尚未退休，难以抽出时间照护孙辈。董振班以自己同事陈先生为例，他生育孩子时，双方父母都在50岁上下，经双方父母及陈先生夫妻二人各方协调下照顾下，孩子总算上了一年级，现在基本上是由陈先生夫妻俩接送。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后，考虑到双方父母均未退休，实在难以再照护二孩，遂不得不放弃生育二孩的念头，更莫谈三孩了。董

振班表示，假如小两口和父母亲不在同一城市生活，隔代照护仅从时间上来说就是难上加难。二是理念上存在差异。年轻人的育儿理念、生活方式与父辈存在明显差异，导致父辈难以融入小家庭，甚至会因此产生家庭矛盾。三是精力上存在困难。据上海市卫健委统计，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0.73岁。如果生育二孩、三孩，育龄夫妇的父母年龄极有可能已超过65岁，此年龄段的人精力不济实属常态。

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董振班遂提出如下建议：

可建立弹性退休制度。董振班表示，虽然国家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延迟退休政策，但是该政策与建议的“弹性退休制度”并不相悖。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于那些有二孩、三孩生育意愿的家庭，同时祖父母、外祖父母又愿意提前退休照护孙子女的，可依其申请准予提前退休，且相应待遇视同按时足龄退休（待遇适当降低亦无可），毕竟维持人口的长期

均衡发展也是当务之急。

同时，董振班认为要普及现代育儿理念，弥合代际差异。三代同堂带来的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政府要加强指导和协调。曾有报道称，青岛市教育局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独立的家庭教育处，搭建“家长大课堂”“家长面对面”“家校合作网”等家庭教育特色品牌，建立了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服务站等家庭教育指导阵地，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普及科学育儿、科学照护知识，这些措施对于弥合育儿理念的代际差异，预防因照护婴幼儿产生家庭矛盾，共同促进孩子成长起到很好的作用。

此外，对存在照护困难的家庭可给予一定经济补助。《决定》的第二十三条：“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并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公益金或基金，重点用于帮扶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借鉴这个思路，董振班表示，可以尝试建立“育儿保障基金”，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确因工作、身体等原因难以进行隔代照护的，可给予育龄夫妇适当的经济补助。

生育率持续降低、人口老龄化加剧，

破局的关键在哪里？

融媒体记者 位林惠 实习生 张红晨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披露的数据，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引发了公众一系列担忧：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三孩”政策能否缓解人口负增长？养老问题该如何解决？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

光放开政策是不够的，要为育龄妇女创造宽松的生育环境

记者：请问陆教授，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了10‰。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陆杰华：这个数据是近几十年来最低的一次，意味着2020年的人口几乎接近零增长，这说明出生水平在迅速下降。尽管2016年放开二孩，去年5月底开始实施“三孩”政策，但低生育率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过去，我们是年轻社会，人口一直在增长，进入负增长之后将会迎来全新的社会形态，当务之急是要适应这种社会形态，化解负增长带来的某些风险，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记者：人口负增长是不是意味着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陆杰华：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是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既得益于政策，也得益于人口红利，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关键

作用。现在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加速，特别是劳动力规模和比例的下降，人口红利开始下行，但还没有完全消失。依靠数量型人口红利发展的时代渐渐远去，下一步我们将及早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变化，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产业结构，以此实现长寿红利，靠质量型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

记者：低生育率的背后，阻碍人口生育潜力释放的原因是什么？

陆杰华：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民的生育基本是政策驱动，但现如今，国民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变化，政策之外，还有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由此来看，驱动的变化意味着光放开政策是不够的，如何为育龄妇女创造一个宽松的生育环境，比如延长产假、设立更多育儿假等都很重要。同样，“90后”“00后”作为日后生育的主体，他们的婚恋观念更加多元，如不婚主义、丁克主义等，都会影响整体的生育水平。

“三孩”政策效果还需观察，未来生育权应回归育龄人群

记者：您认为“三孩”政策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

陆杰华：短期内还不太容易看到实际效果。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二孩的比例在上升，但令人担忧的是一孩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一孩都不生了，何谈二孩？所以在生育过程中要“保一”，就是鼓励育龄人群能够生

一孩争二孩，然后才能向三孩靠近。放开“三孩”只是一个信号，能不能提升生育水平，还需要观察。

因此，做好一孩和二孩的相关配套显得尤为重要。未来的生育配套措施，要在一孩和二孩上下更多功夫，让剩余的力量真正释放出来，才会让生育率不下降，甚至有所回升。

记者：有人认为女性的社会困境是影响生育的核心问题，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陆杰华：从性别平等上来说，我认为这是失之偏颇的。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就业，去和男性获得同等平等待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很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由此一来，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推进性别平等，不仅仅是鼓励女性参与社会事务，还应鼓励男性积极参与家庭事务。

养老面临多重压力，实现代际反哺需拿出“真金白银”

记者：近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或就近居住。您觉得这一倡议在推进过程中有哪些压力和阻力？

陆杰华：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或就近居住，其实是为成年子女赡养老人提供一种环境。但是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多子女到外地工作，若与父母同住就面临较多问题：一是住房和落户的问题，二是养老金统筹和医保统筹的问题。

因此，各部门应围绕同住或就近居住制度上的一些盲点，制定可操作性的政策，创造同住的社会环境。再就是通过政策鼓励同住或就近居住，比如与父母同住，购房是否有一些优惠或补贴？鼓励同住不能只是口号，各地政府应拿出“真金白银”来设计制度，这样才能够创造一个代际反哺的宽松环境。

记者：目前全民关注养老成为常态，您认为该如何缓解？

陆杰华：这是当今社会面临的比较突出的民生问题，过去国人关注教育、关注看病，现在全民关注养老。解决养老问题，一方面要靠家庭，家庭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和“守门人”。另一方面就是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做好服务。首先，国家主要发挥兜底作用，做好低收入人群、失能人群和无保人群养老工作。另外就是推行社会化养老，打造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9073”格局，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在社区，3%在机构。其中，社区应该提供更多的生活照料、慰藉和娱乐生活，解决老年人吃、行、医、乐等方面的困难。提供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国家最近几年着力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目前还没有成为养老支柱，需要特别关注和培植，鼓励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方便、更低成本、更多样的养老服务内容。

建言集束

JIANYAN JISHU

让城市更有“韧性”

本报记者 吕东浩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不仅需要应对极端气候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还要应对公共安全问

题。”如何灵活精准应对、减少损失，保障城市健康发展？今年大连市政协全会期间，张新天委员呼吁：让我们的城市更有“韧性”。

韧性城市，“韧”在哪里？张新天解释说，“韧性城市”是指城市运行系统状态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变化，受到外部冲击和面对不确定因素时，还应具备承载（抵抗力）、适应（免疫力和）和恢复（自愈力）能力。

张新天认为，城市建设仅强调“抗灾”已难以应对风险，以“耐久”为核心的“韧性城市”建设思路，才能更加全面地提升城市安全性，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要求。为此，他建议首先通过“韧性城市”顶层设计制定韧性发展目标，包括城市的承载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三个方面，同时健全相应体系，建立监测、评估、预警和反馈机制。

鉴于“韧性城市”建设是一项多维度、统筹式、系统化的工程，张新天提出，在保障基础方面，应遵循“让”“防”“避”的原则，强化城市“硬件”布局。“让”——开展全方位风险评估，凡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在空间布局上应“让”出灾害高风险空间。“防”——完善防灾分区、开敞空间，预留应急和留白用地。“避”——完善公共安全设施，形成“防”的格局。“让”——建设立体疏散救援通道，强化大型体育场馆等公共建筑平战功能转换、推进综合型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做好“避”的准备。

张新天还特别强调，要让广大市民对城市脆弱性以及“韧性城市”建设实施政策形成共识，积极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强化社会主体和公众参与，形成应对灾害风险的强大合力。

在城市更新中建设“韧性城市”

张轲

房屋建筑是人们进行一切生产生活的物质载体。城市中既有建筑数量众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大规模的建设阶段已经过去，点式或局部更新已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手段，对存量建筑进行有机更新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做出了城市更新的重大决定，这既是“惠民生、促发展”的重大决策，也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举措，其内容涵盖了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拆建、老旧办公楼宇、厂房、商圈提升、老旧平房四合院等方面，改造内容则有老楼加装电梯、房屋抗震加固、保温节能改造、地下空间改造等多项民生内容。

“韧性城市”顾名思义，是为了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等领域发生的重大灾害，实现城市建设和发展有空间、有存量、有弹性、有储备，形成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证体系，对于灾害时保障房屋安全，从而保障人身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近几年，极端天气带来的城市内涝、暴雨、大风、火灾，安全事故导致的爆炸、新冠肺炎疫情等烈性传染病带来的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巨大，韧性城市建设

迫在眉睫，作为韧性城市建设重要内容的房屋建筑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房屋建筑更新中有许多和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大力开展韧性城市建设，如何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必须花应该花的地方，需要认真思考。首先，城市更新中除了重视房屋节能改造外，还要加大力度进行房屋抗震加固。过去许多房屋由于居民意见不一致，导致抗震加固处于实际停滞状态。北京等许多城市是抗震8度设防区，属于高烈度地区。要充分认识地震的危害，对2000年以前建成的未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进行房屋抗震鉴定和相应的抗震加固，确保地震来临时大量房屋建筑不倒塌，少伤人，易修补。

其次，对于百姓呼声强烈的老旧住宅加电梯的城市更新项目，应在考虑适老化改造的同时，充分考虑增设电梯后产生的附属建筑对于已有住宅安全的影响。应确保发生火灾疏散时逃生路线便捷通畅，电梯应做到双路供电或具有自平层功能，增设电梯部分附属建筑的使用寿命应至少达到30年。同时应对已有电梯进行检查更新。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大约有800余万部

电梯，仅北京就有30余万部各种类型各个年代的电梯在运行，这些电梯型号多样，许多已经运行20年以上仍未更新或更换，应在“十四五”期间对这些老旧电梯逐一进行安全检测和检查，采用多种出资方式进行更新，避免电梯伤人。

第三，对正在使用或即将使用的有人居住地下空间，如物业保洁、保安、工程维修人员的居住场所和集体宿舍，进行规范化改造。在房屋结构安全、消防疏散、通风采光、卫生防疫等多方面进行规定和审查，使保洁、保安、工程维修这些城市运行保障人员住得放心、住得安全。

最后，要充分使用数字化技术，摸清房屋底数。对既有房屋逐栋进行灾害普查，整合共享既有房屋信息数据，在数字地图上标识每栋房屋的层数、面积、建设时间、结构形式、历次改造信息、使用功能等重要信息，为应急指挥和防灾救灾提供准确的基础资料保障和支撑。

应高度重视城市更新与韧性城市建设，准确找出具体结合点，尽快开始试点工程建设，以点带面，发挥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十一届政协委员）